

明清徽州杂字研究

戴元枝 /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明清徽州杂字研究

戴元枝 /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徽州杂字研究 / 戴元枝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444-7509-9

I. ①明... II. ①戴... III. ①汉语—识字教育—研究—徽州地区—明清时代 IV. ①G722.4②G527.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9016号

责任编辑 顾 翊 朱剑茂

封面设计 郑 艺

明清徽州杂字研究

戴元枝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官 网 www.seph.com.cn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7509-9/H·0263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本书系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明清徽州
杂字的整理与研究”（14YJAZH013）的研究成果

目 录

绪论 “另一路识字教材” / 1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1
- 二、研究现状与方法 / 5
- 三、核心概念与主要内容 / 9
- 四、杂字概述 / 12

第一章 明清时期徽州杂字盛行的原因 / 16

- 一、现实的吁求:人多地少的困境与从商风气的盛行 / 16
- 二、传统的影响:兴学重教与重视蒙学教材编写的传统 / 18
- 三、物质的保障:明清徽州刻书业的兴盛 / 21

第二章 明清徽州杂字的分类 / 24

- 一、从名称分类:是否命名为“杂字” / 25
- 二、从编排方式分类:是否标明类目 / 48
- 三、从语言表达形式分类:是否采用整言押韵 / 59

第三章 明清徽州杂字的特点 / 77

- 一、明清徽州杂字与“三百千”比较 / 77
- 二、明清徽州杂字与其他地域杂字比较 / 103

第四章 明清徽州杂字与徽州文化 / 117

- 一、明清徽州杂字与儒家伦理 / 117
- 二、明清徽州杂字与商业启蒙教育 / 123
- 三、明清徽州杂字与法律教育 / 132
- 四、明清徽州杂字与契约教育 / 142
- 五、明清徽州杂字与徽州民俗 / 148



第五章 明清徽州杂字的个案研究 / 159

- 一、古歙州胡氏《两得心知》:古代识字教材的创新之作 / 159
- 二、徽州《新镌六言杂字》:明清杂字教材的成熟之作 / 165
- 三、《新编对相四言》祖本考:张志公《试谈〈新编对相四言〉
的来龙去脉》补正 / 173

附录 明清徽州杂字十种 / 181

- 一、《四言杂字》 / 181
- 二、《应急杂字》 / 183
- 三、《启蒙六言杂字》 / 184
- 四、《新镌六言杂字》 / 188
- 五、《开眼经》 / 196
- 六、《新镌便蒙群珠杂字》 / 202
- 七、《日平常》 / 211
- 八、《易见杂字》 / 219
- 九、《百韵联珠杂字》 / 227
- 十、《启蒙切要杂字》 / 229

参考文献 / 236

后记 / 242

绪论 “另一路识字教材”

实际上,也确是靠了这一路土教材,才真正解决了中下层社会人家(也包括只想作土财主不怎么巴结功名的上层人家)的子弟只用短时间学会识字,以应付日常需要的问题。任何一种编得好些的杂字书,大致都能用一次(顶多两次)冬学的时间学完;学会那些字,记记账,写写信,看看通俗小说和唱本,的确可以对付对付了。恐怕要归功于这类“上不得台盘”的杂字书,在封建社会历史上相对地减少了文盲在全社会的比例。

——张志公著《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一) 研究缘起

识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清代王筠在《教童子法》中就强调“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因此,识字成为古代蒙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古人编写了两类识字教材:一类是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代表的蒙学识字教材,这类识字教材为官府所承认,编法也比较雅驯;另一类则主要流传在民间,宋以后统称为“杂字”。瞿菊农先生认为,“各种杂字书在过去对识字教育曾经起过相当的作用,流传广泛长久,是重要的传统教材”。^① 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一书中则将杂字称为“另一路识字教材”,对其历史、类别和特点等进行了论述,并高度评价道:“杂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②

张志公先生在论述传统蒙学教材时提及了明代徽州刊刻的一种《群珠杂字》,

^① 瞿菊农《中国古代蒙养学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4期第52页。

^② 张志公著《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在书目、书影中还呈现了清代屯溪开益堂梓行的以“丈尺斤两,升斗秤量”开头的《四言杂字》。这引发了我们对明清徽州杂字的关注:杂字的使用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有研究者认为,“宋元版杂字现在已经没有了踪迹,明版杂字已成凤毛麟角,清代和民国版杂字已不多见”。^①近十年来,我们在黄山学院徽学资料中心查阅资料,在屯溪旧书市场、乡村农家搜集古籍时,不仅经常见到张志公先生提到的上述两种杂字的刊本和抄本,还见到了大量张志公先生未曾提及的徽州杂字,而且多为明清时期的杂字。这些发现引发了我们进一步系统地搜集并进行专门研究的浓厚兴趣。

十年来,我们竟然搜集、购买了近200册、60余种徽州本土的杂字书。这些虫迹斑斑甚至破烂不堪的杂字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反映了明清时期徽州蒙学教育的基本状况,是研究徽州教育的活化石;其内容涉及徽州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徽州文化的重要遗存,故而也是研究徽州庶民文化的重要文献。所以,徽州杂字应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并进行研究,不能仅将其当作一般的蒙学教材而弃之不顾。就如周谷城先生所说,研究文化史应着眼于以往各时各地社会上多数人的文化状况,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化,不妨研究当时普通人所诵读的蒙学教材,因为“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中,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②但是,在查阅有关徽州学、蒙学的论文著作时,我们发现人们对徽州杂字的研究较少:在研究徽州文化时,或只将杂字作为一般的文献资料而偶有提及,或只是介绍徽州杂字的单个文本,没有做系统的观照;研究杂字的论著虽有一定数量,但只是在其中零星地介绍徽州杂字,没有将徽州杂字作为富有地域特色的文本进行专门的研究。可见,目前对徽州杂字的研究十分匮乏,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研究。

古代徽州文风昌盛,并且处于万山环绕之中,兵燹罕至,所以许多珍贵的纸质文献得以和古民居一道保存下来。徽州民众又素有“敬惜字纸”的传统,他们教导孩童云:“字纸乃圣贤面目,亦天下之大宝也。千里之遥,万里之远,付数言可以相通,万古流存皆赖字迹之为据,实继往开来之大功。况且祖宗父母之名讳,古圣先

① 李国庆《杂字研究》,《新世纪图书馆》,2012年第9期第61页。

② 喻岳衡编《传统蒙学书集成》,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页。



贤之教化,尤当敬之重之。”^①这种“敬惜字纸”的传统甚至保留至今,也因此使得徽州历史文献资料的留存异常丰富,乃至被誉为“文献之邦”。就杂字教材而言,其在徽州的留存相对于其他区域来说更为丰富,这些极其珍贵的杂字实物为我们研究徽州杂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鉴于徽州杂字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有较为丰富的杂字实物留存,本研究试以“明清时期徽州杂字”为中心,一方面搜集、整理留存的杂字书,保存教育学、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另一方面以此来探讨明清时期徽州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教育状况,以及当时人们文化生活的多个侧面。

(二) 研究意义

古代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尤其是蒙学教育,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形成以私立为主、官办为辅的蒙养教育体系,“择师教子”已成为当时的风尚;许多儒学名士热心于训蒙事业,并编写了大量富有地域特色的蒙学教材。到了明清时期,因徽商雄厚的经济支持和强宗固族的宗族观念的影响,徽州蒙学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在这一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蒙学教育已不仅仅作为科举仕宦的准备,更重要的是作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的重要手段。“随着农工商子弟入学者增加的实际需要,农工商各业知识和技能逐渐充实进蒙学教材,各种杂字类教材开始出现,并得到广泛流行。”^②因此,明清时期的徽州出现了大量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杂字教材,一些徽州杂字甚至明确指出“不习举业,请读斯文”(《事用杂字》);“凡师教训,不可执一。富足之家,求乎上达,当明五经;贫乏之门,止于耕读,勿宜切要”(《四字通用》)。

那么,这些供田夫牧子、贩夫走卒使用的杂字教材和正统的蒙学教材有何不同?对现代基础教育中的识字教材的编写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从中我们可以探寻出徽州教育哪些地域性特点?另外,明清时期的徽州杂字作为一种满足庶民小儿日常生活需要的蒙学教材,不仅是一种让蒙童识得文字符号的文本,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其记载了民众生活的哪些内容?反映了徽州文化的哪些侧面呢?本书试图对此做些探究。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其意义与价值大致如下:

(1) 通过对徽州杂字刊本、抄本的搜集与整理,保存徽州教育的实物资料,并勾勒出徽州杂字在明清时期出版、使用的概况,为研究徽州教育提供一条新的

^① 刘伯山编《徽州文书·第二辑(8)·黟县十都宏村万氏文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7页。

^②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路径。

(2) 通过对所购藏的近 200 册、60 余种徽州杂字进行比较,归纳出徽州古代识字教材基本的选字标准、不同的编写方式等,为基础教育中识字教材的编写提供有益的参照与借鉴。

(3) 杂字多为满足百姓日常生活需求而编写,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与其他地方杂字相比,徽州杂字反映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如徽州作为程朱阙里、商贾之邦,其杂字中特别重视封建伦理教化、商业及法律启蒙教育。其中又有大量的民俗文化、职业知识的介绍等内容。对此进行研究,是为了呈现出古代徽州庶民的生活形态、教育方法以及文化传承方式等,进而提炼出对当前民众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建设、商业经济发展有益的成分。

(4) 徽州杂字除收录人们日常生活常用词汇外,有的还特意收录了一些徽州地方俗语和难读难写的字词,如清乾隆年间徽州延古楼梓行的《释义使用世事通考杂字》中收录“俗语类”“古字类”等;有的甚至直接把乡音字汇类的书直接命名为《乡音杂字》。因此,整理徽州杂字中的地方俗语和难读难写的字,尤其是其中的“俗语类”“古字类”部分,为徽州方言及古文字研究提供了稀见的实物资料。

虽然徽州杂字研究有以上理论和应用价值,但研究起来并不容易。首先是资料搜集整理的困难。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及史料时说:“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亡,斯则为例确多,不可确举。”^①他的阐述也反映了徽州杂字教材留存的现状。目前所见的徽州杂字教材不仅在一般的教育史或蒙学研究著作中鲜有提及,即便偶尔提及也语焉不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论者不知道这些杂字教材的存在,或者知道但仅知其名而未见其书。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手抄本,有些可能是抄自至今还有不少留存的刻印本,有些则可能就是唯一的稿本,而这些稿本是真正的“孤本”。如果不进行抢救性的搜集研究,那么包括这些“孤本”在内的徽州杂字资料会进一步散佚不存,这对徽州教育乃至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来说都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损失。

其次是运用残缺的资料进行系统研究的困难。梁启超先生认为,研究历史用残缺不堪、缺乏联系的史料来恢复历史原貌十分困难,他说:“史迹既非可由冥想虚构,则不能不取资于旧史;然旧史所能为吾资者,乃如儿童用残之旧课本,原本本已编辑不清,讹夺满纸;然复东缺一页,西缺数行,油污墨渍,存字无几。又如电影破

^①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片,若干段已完全失却,前后不相衔接;其存者亦罅漏模糊,不甚可辨别。”^①因为一般图书馆、博物馆很少完备地收藏杂字这类庶民小儿所使用的教材,所以本研究所使用的杂字教材多数是数年来在旧书集市或到农家搜集、购买所得,就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这近200册、60余种杂字课本已经被“用残”了且之间“不相衔接”。我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其进行考辨、发掘并寻找其之间的关系,试图恢复古代徽州识字教育的原貌。其艰辛的程度可想而知,其结果也难尽如人意,又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吾侪今日,乃如欲研究一燹馀之芜城废殿,从瓦砾堆中搜集断椽破甃,东拼西补,以推测其本来规制之为何若;此种事业,备极艰辛,犹且仅一部分有成功希望,一部分或竟无成功希望”。^②我们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能从残垣断壁、断砖破瓦中窥测这荒芜的城、废弃的殿昔日的繁华与辉煌。

二、研究现状与方法

(一) 研究现状

数年来,研究徽州文化的成果十分丰硕,研究杂字的成果也有一定数量,但是缺乏对徽州杂字的专门研究。徽州杂字的研究现状呈现出如下三方面特点。

(1) 整理徽州文献时多侧重于文书、族谱和文集等,较少关注杂字。

近年来,人们注重搜集、整理徽州地方文献,包括族谱的整理保存、文集的校订刊行和珍贵文书的影印出版,但作为徽州蒙学教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杂字则很少被关注。如刘伯山编辑的《徽州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辑第三册“婺源十都方思山胡氏文书”收录了嘉庆戊辰年(1808年)虬村开益堂重刻的《珠玑杂字》和屯溪茹古堂梓行的《新镌便蒙群珠杂字》,但仅影印了两书的封面和首末页,收录固然因为它们是徽州杂字中常见的两种重要类别,未全录则反映了编者并不重视其文献价值。一般图书馆、博物馆也很少完备地收藏这类庶民小儿所使用的杂字教材,偶有零星收藏,也是随着其他徽州文献打包一并进入馆藏,未作专门的归类,且缺乏系统的整理。

(2) 研究徽州文化时,或将杂字作为一般文献资料予以提及,或只是分析徽州杂字的单个文本,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

杂字是乡村塾师或市井文人为应付民众日常生活需要而编写的民间识字教材,贴近人们的生活,反映了徽州民众的生活状况和民风民俗。文化研究者在论

①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②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述徽州某种文化现象时,也常将杂字作为一种文献资料予以提及,如叶显恩在《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论及田租收取时引《新刻徽郡补释士民便读通考杂字》的一份“佃田约”来论证明代徽州田租收取既有硬租,也有活议;王振忠在《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多次引用徽州杂字抄本《略要杂字》《逐日杂字》《通用杂字》《备用六言杂字》等来论述徽州民间祭祀礼生分家等习俗活动;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论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时提到明崇祯年刻本《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以及清乾隆刻本《新刻增订释义经书世事通考杂字》,并指出后一种是前一种的增补本;秦宗财在《明清传统图书市场发展及徽州坊刻市场特色研究》(《商业时代》,2008年第33期)一文中论述明清时期徽州坊刻选题时提及崇祯年刻本《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与明末屯溪开益堂刻本《新镌便蒙群珠杂字》等。但这些研究只是将徽州杂字作为研究徽州某种文化现象的佐证,述及与其相关的一些内容,没有对徽州杂字进行系统研究。

目前专门研究明清徽州杂字的论文共三篇:一篇为王振忠等人的《应急杂字——介绍新近发现的一册徽州启蒙读物》(《古籍研究》,2000年第4期),介绍《应急杂字》的内容以及其中所反映的健讼、饮食等徽州的民风民俗。另两篇均以杂字抄本《日平常》为研究对象,即王振忠的《徽州人编纂的一部商业启蒙书——〈日平常〉抄本》(《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和江巧珍、孙承平的《徽州商业启蒙书〈日平常〉的补充研究》(《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前者把《日平常》仅作为一种徽州商业启蒙书,考述了其成书年代,论述其反映的徽商的经营方式、商业道德以及商业文化特色;后者强调《日平常》是“日用商贾杂字”,对其作者、序文作者及两者的关系等作了补充介绍。可以说,徽州杂字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上述研究者们都只是对某一单个文本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没有对徽州杂字这一类别做整体系统的观照与研究。

(3) 有关杂字研究的论著虽有一定数量,但当涉及徽州杂字时只是零星地介绍,没有将徽州杂字作为富有地域特色的文本进行专门研究。

杂字作为古代教育的重要文献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以“杂字”为题名或关键词,利用维普科技数据库等进行检索,共有40余篇有关杂字的论文:这些论文有对杂字进行整体研究的,如顾月琴的《我国古代民间杂字教材中的职业教育》(《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1期)认为杂字是底层百姓进行职业教育的实用教材,分析了几种代表性的杂字中的职业教育内容;李国庆的《杂字研究》(《新



世纪图书馆》,2012年第9期)对杂字的起源、发展、版式、句式、内容、功用、传世版本与研究价值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王有英的《民间识字课本中的教化意蕴——“杂字”与社会教化》(《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分析了杂字的社会教化功能。

有对某一种杂字进行探讨的,如王静如等人的《西夏文〈杂字〉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对西夏文《杂字》的来历及文本做了简要介绍,尤其对西夏文《杂字》的特点等做了深入研究;邵则遂的《陈士元〈俗用杂字〉中的应城方言词》(《语言研究》,2008年第4期)介绍了陈士元的《俗用杂字》记录的明代湖北应城方言词,分析各词的语义和语音;王其和、谭景玉的《〈庄农日用杂字〉方言语词汇释》(《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2期)主要汇辑解释了马益著的《庄农日用杂字》中的方言语词,是研究方言的重要资料;文志勇的《从俄藏汉文〈杂字〉看西夏社会发展》(《兰州学刊》,2009年第2期)从俄藏汉文《杂字》辑录的当时西夏常用语词的角度分析了西夏纺织业、农牧水利、酿酒业等的发展情况。

也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如朱凤玉的《敦煌写本〈开蒙要训〉与台湾〈四言杂字〉》(《中国俗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第1辑)对敦煌写本《开蒙要训》和台湾现存《四言杂字》进行了比较,并强调了《四言杂字》的台湾风土特色。

目前,有关杂字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张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指出杂字是不同于“三百千”在民间流传的另一路识字教材,并对其历史、类别、特点等进行了论述,这是教育学上首次对杂字教材进行关注;徐梓先生的《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各个时期不同的蒙学读物,并涉及各时期与此相关的杂字;台湾学者郑阿财、朱凤玉的《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分析了杂字类蒙书《俗务要名林》及《杂集时用要字》,并探讨了二者与其他字书的关系及价值。

徽州杂字的留存比其他地域更为丰富,研究者也时有提及,如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一书的书目中列出了屯溪开益堂梓行的《四言杂字》,并在书影中呈现了其首页内容;李国庆在《杂字研究》一文中提到现存极少的明代编印的五种杂字,其中就有明崇祯刻本《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顾月琴在博士论文《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明清时期杂字研究》中多次提及屯溪开益堂梓行的《新镌便蒙群珠杂字》的内容;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论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时也提到上述《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以及徽州黄惟质订补的乾隆刻本《新刻增订释义经



书世事通考杂字》。研究者在研究时虽然不时提及多种徽州杂字,但由于研究者侧重点和关注的角度不同,涉及徽州杂字的内容并不多。

综上所述,尽管徽州杂字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目前对徽州杂字的研究还不广泛、系统,而有关徽州杂字的专题研究则更是缺乏。

(二) 研究方法

杂字这种庶民小儿的启蒙教材历来备受忽视,官修正史,语焉不详,历代书志、书目很少著录。因此,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全面广泛地搜集各种杂字教材;其次,综合分析徽州杂字在明清时期盛行的原因、种类、内容、特点以及所反映的徽州社会文化生活;再次,从每一类杂字教材中选择典型的个案加以分析并探讨明清徽州杂字的当代价值。力求从翔实的原始材料中归纳总结,得出切实的结论,并做到点面结合。具体的研究方法如下:

1. 文献资料法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本课题就是在广泛搜集徽州教育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确立选题并进行研究的。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检索也查阅了一些资料,以期全面了解明清时期徽州杂字教材的留存及研究情况。通过考辨,鉴别资料来源的真实性和价值,力求使这些材料翔实、可靠、有用。

2. 田野调查法

目前留存的杂字教材,除被文化馆、博物馆零星收藏或被古旧市场的书商收购外,更多的仍散落在民间。因为徽州民众至今保留着“敬惜字纸”的传统等原因,所以其先辈们使用的包括杂字在内的教材仍有大量留存。为此,我们曾多次到古徽州一府六县所在区域的农户去调查杂字教材的留存情况,试图编写徽州杂字教材书目;搜寻购藏,并进行整理、研究。

3. 比较法

将不同版本的杂字进行比较,考证其源流、流传情况;将杂字与传统的蒙学教材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徽州杂字作者的群体性、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等方面的特点;将徽州杂字与其他地域的杂字进行比较,分析其内容与形式等方面的地域特色。

4. 统计法

对搜集到的明清徽州杂字进行分类统计,编辑书目和书影;在研究时,也会对不同版本杂字的字种、字量等进行统计,并比较其异同,分析其选字特征和呈现频率。



三、核心概念与主要内容

(一) 核心概念

1. 徽州

“徽州”是一个地区概念。地区研究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和范式,首先出现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美国,此后10年又传布到世界其他地方。徽学研究作为地区研究的一种,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从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叶显恩、章有义、栾成显、周绍泉等人利用徽州文书研究徽州土地关系、租佃关系以及赋役制度的系列成果问世,徽学逐渐发展为一门学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徽学研究更成为热点,成为国内三大地域显学(藏学、敦煌学、徽学)之一。

虽然地区研究很热门且成果丰硕,但是对特定地区研究中的“地区”进行准确的界定颇不容易,徽学研究中的“徽州”就很难准确界定。肯尼亚文化学者儒玛称:“地区研究的基本含义非常简单。所谓地区是指一个大的地理区域,它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诸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①因此,本研究中的“徽州”首先指作为地理概念的“徽州”。宋宣和三年(1121年),歙州改徽州,下辖歙县、休宁、婺源、绩溪、黟县、祁门六县,即“一府六县”,这种行政建制历经元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因此,地理意义上的“徽州”主要指的是这一府六县所辖的区域。其次是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徽州”。因为任何地域的文化都不是封闭的,它会逐渐向外传播,与外界文化交流。所以作为地理概念的“徽州”边界是相对清晰的,而作为文化概念的“徽州”边界却相对模糊。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徽州,由于经营商业、科举仕宦等原因,使得人口流动极为频繁,流向的地域极其广大,近处的如旌德、泾县等,远处的如景德镇、武汉、苏州、扬州等,尤其是去外省经营的徽商在他乡保存传播了从建筑、饮食等物质文化到观念、礼仪等精神文化,造成文化意义上“徽州”范围的确定相当困难。

鉴此,本研究中的“徽州”指地理意义上的“徽州”。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本研究所依据的文献出自地理徽州,即徽州“一府六县”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编写、梓行、使用的杂字,而这些出自地理徽州的文献更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文化徽州的本质特征。

^① 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0页。



2. 杂字

“杂字”主要指汇编日常生活中某一类常用的文字,多数编排成句式整齐、句末押韵的识字教材。它是与“三百千”等童蒙识字教材相对的“另一路识字教材”,主要供民间中下层社会的儿童及成人识字之用,其中也包含着各类知识,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二) 主要内容

本书包括绪论、正文、附录三大部分。

绪论在强调杂字是“另一路识字教材”的基础上,阐述明清徽州杂字研究的缘起、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核心概念与主要内容,并从整体上对杂字的发展轨迹、性质功能进行论述。

正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论述明清时期杂字在徽州盛行的原因。主要从明清徽州从商风气的盛行吁求民众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徽州宗族兴学重教与重视编写蒙学教材的传统影响,以及明清徽州刻书业的兴盛为其提供了物质保障等方面探讨杂字在明清徽州盛行的原因。

第二章:分类介绍明清徽州杂字。在目前所见的三种杂字分类法的基础上,提出了“逐层多维分类法”。对我所见到的明清徽州杂字,从三大层级、六个维度进行了分类:一是从名称的角度,即是否命名为“杂字”,将明清徽州杂字分为命名为“杂字”的杂字书和没有命名为“杂字”的杂字书;二是从编排方式的角度,即是否直接标明类目,将明清徽州杂字分为分类编排的杂字与不设类目的杂字;三是从语言表达形式的角度,即是否采用整言押韵,将明清徽州杂字分为整言韵语与散言词汇两大类。在三大层级之下又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分类的目的在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明清徽州杂字的概貌。

第三章:分析明清徽州杂字的特点。明清徽州杂字在古代杂字中极具代表性,将其与“三百千”等正统蒙学识字教材比较,探讨其作为“另一路识字教材”所具有的六方面特点:内容更为全面广博,囊括了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日常生活联系尤为紧密,注重实用性;千本千面,内容各不相同;形式多样,语言通俗;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作者的平民化、群体性。明清徽州杂字作为一种地域性杂字,受徽州特定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内容形式尤其是内容上呈现出异于其他地方杂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道德教育方面,注重儒家伦理思想;职业教育方面,突出商业教育;生活教育方面,强调礼仪、民俗、契约等内容。



第四章:探讨明清徽州杂字所反映出的徽州文化。为“应用家常”而编写的明清徽州杂字从多方面反映了徽州百姓的生活文化。本章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明清徽州杂字与民间社会教化。杂字在数百年的使用、重编的过程中已突破单纯的识字功能而具有明显的道德教化功能,徽州杂字更为明显地彰显了这种功能的转变,其所包含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邻睦族、崇勤尚俭、惩恶劝善等丰富的教化意蕴,对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二是明清徽州杂字与商业启蒙教育。徽商作为明清时期有着重大影响的社会群体,其形成不仅依靠经年的资本积累、成熟的经商之道,更拥有扎实的启蒙教育来支撑。通过杂字中有关商业的内容来探讨徽州人如何营造重商的社会风习,如何建构儿童的基本知识心理结构,为徽州商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原动力。三是明清徽州杂字与法律教育。徽州杂字大多列有“刑宪类”“律法类”“讼狱类”等,有的甚至将律法知识作为首要内容予以介绍。通过对徽州杂字中涉及的法律内容来分析明清徽州法律教育的内容、形式,并探讨明清徽州杂字中法律教育内容大量出现的原因。四是明清徽州杂字与契约教育。明清徽州不仅留存大量完好的契约文书,还存有大量含有契约内容的杂字,这说明古代徽州人在儿童启蒙阶段就十分重视契约教育。这种契约启蒙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在杂字中确立契约观念、传授契约知识、呈现契约范本,最终培养其签订契约的基本技能。五是明清徽州杂字与民俗文化。徽州很多杂字专门列有“时令类”“婚姻类”“丧祭类”“讼狱类”“人事类”等类别,从中我们可以探寻带有徽州地域色彩的岁时节日、殡葬嫁娶、分家诉讼等民俗文化。

第五章:明清徽州杂字的个案研究。选出三种代表性的杂字进行个案研究,主要从版本源流、内容形式、编写策略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明清时期徽州杂字的当代价值,即对当前识字教材的编写和识字教育实施的借鉴意义:一是《两得心知》。《两得心知》是歙州塾师胡为治于1849年左右编成、后经多人修订且曾在徽州被广泛传抄的一种全新的识字教材。其基于汉字特点、儿童心理和生活实用等原则,对传统识字教材的弊端做了纠正,确立了口语化、常用性的选字标准,采用了情境化、归类式的识字方式,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中的小学识字教材的编写及识字教学实施,都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二是《新镌六言杂字》。考辨其产生的年代与作者,重点分析其作为明清杂字教材的成熟之作在内容形式上具有知识全面、雅俗兼备,内容连贯、承接自然,用语浅易、音韵和谐等特点。三是徽州木刻本《对相四言杂字》。张志公在多种论著中认为《新编对相四言》的底本是元初据南宋本修改复刊的,且怀疑应该还存在一个宋代祖本。通过对新发现的徽州木刻本《对相四言杂字》进行考辨,发现该书刻印的年代是明朝嘉靖后至天启前,或清代。从该书的文